⑬⑰北大藏稿本《赵氏世德录》第18册《龙冈纪笔》。
⑭乾隆《震泽县志》卷10按语。
⑱康熙《江西通志》卷12，《户口田赋》。
⑲㉕乾隆《江南通志》卷68《食货志》。
⑳㊴雍正《广东通志》卷7《编年志》。
㉑民国《福建南平县志》卷 4《户口志》、卷5《田赋志》。
㉒㉓《清高宗实录》卷36、卷46。
㉔朱云锦《豫乘识小录》卷上《田赋说》。
㉖光绪《定远厅志》卷7《赋役志》。
㉗光绪《耒阳县志》卷2《田赋》。
㉘㊱《乾隆元年五月十七日山西巡抚觉罗石麟题本》。
㉙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58《田赋略一》。
㉚同上，卷60《田赋略三》。
㉛乾隆《长治县志》卷8《赋役》。
㉜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63《田赋略六》。
㉝光绪《河曲县志》卷3《丁徭》。
㉞光绪《寿阳县志》卷3《赋役志》。
㉟道光《阳曲县志》卷7《户书》。
㊲嘉庆《介休县志》卷4《田赋》。
㊳乾隆《孝义县志·田赋》。
㊵康熙《麻城县志》卷5《食货志》。

戴名世《四书朱子大全》书后

——传已散佚的戴名世著作的发现

香港大学　何冠彪

南宋淳熙年间（１１７４—１１８９），朱熹撰成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，并于绍兴元年（１１９０）首次在漳州刊行，合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从此，便有《四书》这个专名。到了元代，仁宗在皇庆二年（１３１３）下诏恢复科举，制定以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策试。明清两代沿袭了这个成制。于是这部编著就长期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。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行世以后，渐渐有些学者采《朱子语录》附于《章句》或《集注》之下。这种体制发端自真德秀，后来增益而为《四书集编》一书①。当风气一开，仿者效尤，据《四库全书·四书大全·提要》记载："祝洙仿而足之，为《四书附录》。其后蔡模之《四书集疏》、赵顺孙之《四书纂疏》、吴真子之《四书集成》，皆荟萃众说，以相阐发，而不免稍涉泛滥。惟陈栎《四书发明》、胡炳文《四书通较》为简当。栎门人倪士毅又合二书为一，颇加删正，名曰《四书辑释》。至明成祖永乐中，诏儒臣胡广、杨荣等编集诸家传

注之说，汇成一编，赐名《四书大全》。御制序文颁行天下学校，于是明代士子为制义以应科目者，无不诵习《大全》，而诸家之说用废”②。《四书大全》包括《大学章句大全》一卷、《或问》一卷、《论语集注大全》二十卷、《孟子集注大全》十四卷、《中庸章句大全》二卷、《或问》二卷，共四十卷。虽然是书与《五经大全》并颁，但当时的程式实以《四书》义为重，这样便使明代的读书人把《五经》束之高阁。自此，他们所研究的只是《四书》，所辨订的亦只是《四书》而已。因此，在明人心目中，《五经大全》远不及《四书大全》重要，就是后来《四书》的讲章浩如烟海，也是滥觞自《四书大全》一书。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四书大全》说“由汉至宋之经术，于是始尽变矣，……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抵，具在于斯”③。

由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束缚读书人过久，渐渐亦产生经义不依朱注为高的现象。这种风气在明末十分盛行，入清后更形成两个反应。第一，顾炎武等学者提倡返回汉唐注疏；第二，吕留良等则盛唱程朱之学，希望使经义能一字一句重返朱注。虽然两派学者的取经不同，但他们的主张都是针对明季经义讲章的风尚而提出的。

戴名世继吕留良以批选八股文著称于时。“凡所作，贾人随购而刊之”④。而“海内学者”，“转相购买，几于家有其书”⑤。“时文发明远近”⑥，“文字流传江南”⑦，“举业之家，辄多以文章相示”⑧，请求批正。甚至出现“书肆中嫁名借刻”⑨的现象。可见戴名世对清初八股文影响之大。他不但对吕留良推崇备至，而且隐然以继承者自居。在经义方面，名世和吕留良一样主张以朱注为依归，而且进一步提出“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”⑩的口号。然而，他对朱棣所颁行的《四书大全》和《五经大全》深表不满，认为两书所采取的注疏不够纯正，可以说犯了“是非互陈，邪正并列”的毛病。由于它们是科举取士的标准，因此使“学者眩瞀莫辨，而虽显背于朱子之旨，亦与朱子并以为不利”⑪。名世平生有三大学术志愿，第一就是“欲重订《四书、五经大全》，并立志日后“入山著书，首当从事于此”⑫。

戴名世许下这个志愿，除希望订正《四书大全》和《五经大全》的驳杂外，更希望借此补救脱胎自两书的讲章对经学造成的破坏。他指出“举业家”虽辩称“经之旨浩博，士不能徧观而尽识”，因而“为之汰其繁而标举其大略”，编成讲章，“期利于场屋”，但以讲章为学问，却使“苟且之见，谬悠之说，穿凿破碎之论，深入于肺腑而不可救药”⑬。其次，讲章的流行，亦象征了传统经学的败坏。他说：“自先王之道不明，而世有讲章时文之学，盖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！昔者圣人之遗经，掇拾于秦火之余，汉、唐儒者，其为训诂笺疏，不啻数十家，皆未能尽得圣人之旨，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。讲章之徒，曾不能窥汉、唐之藩篱，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奥，何其惑也？《六经》者，文之本也。周、秦、汉、唐以来作者多有，而其源流指归，未有不一者也。时文之徒曰：‘吾无所事乎此也’。其说至于苟且以从俗之好，而以是为奔走势利之具”⑭。另一方面，名世认为明中叶以反朱注的风气，同样对经学有害。他说：“自周之衰至于今，儒学既摈焉，圣人之道，扫地无余，独幸有其书尚存，而学者大抵皆浅陋，不能申明圣人之意。自汉之训诂笺疏，已失其旨，而学宫所立《五经》家，皆无当于大道之要。盖道莫著于宋，宋之时不能用之，至有明而显。嗟夫！其言虽显于明矣，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。天下之士，非科举之文无由进；而科举之文，非宋氏诸儒之说辄斥不收。夫非宋氏诸儒之说不收，其意岂不盛哉？而学者第借其说以为进之阶，问其何以学？曰科举故也。则即其终学之日，而固已叛宋氏诸儒之道矣。然当时学者习其书，犹貌为其言，竞竞不敢失坠。至于正德、嘉靖以来，诸儒纷纷而起，良知家言最行于天下，

浸淫蔓延，而士皆以叛宋氏为贤，于是横议之祸流为门户，天下亦自此多故矣”⑮。既然《四书大全》和《五经大全》不够醇粹，时文之徒从事朱学又有名无而实，王学之徒的反朱亦流弊丛生，因此戴名世要提倡纯正的朱学来廓清经学支离破碎的弊病。他说：“昔者经之有训诂也，所以解经也；今者经之有讲章也，所以便为举业者也。经自遭嬴氏之祸，经几亡矣！至宋氏诸儒出而经之大义始大明，……后世有起者，无以复加矣。功令士各治一经，而兼通《四书》，皆奉宋儒之书为宗，学者竞竞守之而勿失，则亦何容其赞一辞而参一见？乃举业家有所谓讲章者……有志君子所为悼经学之榛芜，欲一举而扫除廓清之而无遗者也”⑯。所以，他在三十一岁时已立志“取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训诂笺疏，而去诸家之背谬与其驳杂迂讹者，重订为一书，而窃附于宋儒之后”⑰。八年后，当他透露自己三大志愿时，又以“重订《四书》、《五经大全》”列居首位。

虽然是这样，戴名世到了五十三、四岁时才开始实践上述志愿，编纂《四书朱子大全》一书，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由他发端的。他在《四书朱子大全序》中说，“《四书》义读，取朱子一家之言，为了采掇荟萃，以类相从，而附于《章句集注》之下，盖发端于程君凤来；而余之属笔，则在乙酉、丙戌间。后因简帙重繁，又属程君去其重复，正其讹舛。丁亥，程君举以归余，余更略为出入，而后其书乃为定本。程君于是锓之于板，以广其传。明年（康熙四十七年即１７０８年）春二月，刻且成”。名世在这篇序文中除叙述编纂的经过外，还提出“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”的口号，并申述他的意见：“余以谓古人罢黜百家，独尊孔氏，今之尊朱氏，即所以尊孔氏也”。“诸儒之说，其庞杂割裂而疵谬使学者眩瞀莫辨，而误其所以，汰而去之，固其宜也。然其中不无可采之论，至当之言”，“原不能出乎朱子涵盖之内”，“固亦有所弗暇及也。譬如一堂之上，众说喧呶，纷纭攻讦，苟非穷理之深，析义之精，听之焉能无误哉？”“学者但明于朱子一家之言，而诸儒之说，是非邪正，自了然于胸中，而不为其所乱。”可见，名世提倡朱注，不外希望学者能择取一个较精确的入门途径，不致受“众说喧呶，纷纭攻讦”的现象困惑而致无所适从。其次，他编《四书朱子大全》的目的，正如朱熹纂辑“周、张、二程之意，以为《近思录》”一般盼望学子，“得此而心玩焉，亦足以得其门而入”，而绝不愿意他们“惮烦劳，安简便，以为取足于此而可”⑱。还要指出，戴名世并不是盲目附从朱熹的学说，而且亦能提出怀疑。他在《读易质疑序》中就说：“《易》之理至程《传》而明，至《本义》而益大明，然而年湮世远，师传歇绝，自晚周至宋，凡千余年，伊川（程颐）、考亭（朱熹）钻研反复，得其不传之意，而著之为书。其书出于草创之际，岂无十之二三与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？”

戴名世既对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寄予厚望，所以对该书的编纂，极为认真，就是在它刊行以后，仍不断增补审订，以补其中的不善。即使在“《南山集》案”发生以后，他虽身系囚牢，仍没有放弃这项工作。萧穆称“先生坚苦力学，晚益深造自得，不肯一刻离书。在狱中约计二载余，以昔所编订《四书朱子大全》镌板行世，尚以为未尽也。后取原书增损，条记简端，硃墨淋漓。盖此书羽翼经传，为程、朱功臣，故殷勤为后学计尤功”⑲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，戴钧衡为名世搜辑遗文，编成《潜虚先生全集》十四卷。集内有《潜虚先生年谱》一卷，不知是否戴钧衡所作。年谱作者说曾见戴名世亲手硃笔批识的刻本，该本简首有“另换他人名字亦可”一句，也是名世亲笔写的。年谱所称刻本，可能就是名世在狱中所用的本子。当时，他既陷文字狱之祸，应该料到自己的著作难逃禁毁厄运。如果年谱作者所见的刻本真的是名世在狱中所用的，这句识语会不会暗示这本书若能流传后世，则请获得该书的

人代为传布，倘若政治环境不容许他的著作流传，则可换上他人名字，作为掩饰，好使该书不致失传呢？无论怎样，在戴名世被杀后，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就不行于世了。

“《南山集》案”还未定谳，清廷已著令把“《南山集》板烧毁”，并且行文各省，将“名世所造之书，查出烧毁”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势难幸免。可是，在乾隆朝禁书的时侯，名世的著作名列禁毁书目中只有《南山集》、《孑遗集》、《忧患集偶钞》、《意园文集》、《戴田有全集》、《戴田有集》、《戴田有四书文》、《戴田有时文》八种，《四书朱子大全》竟未见录㉑。《潜虚先生年谱》是此后最早提及此书的文献。谱中“（康熙）四十七年戊子”条云：“《四书朱子大全》一书，予向未之见。庚子（道光二十年，１８４０年），先生之族孙□□以是示予。刻本甚精好，上下方有硃笔批识，或涂乙，或增补，皆先生亲手写。盖刻既成后，先生逐年加校，有未安者仍复审订，将以重梓也。先生获罪，此书遂不行于世”㉒。在年谱作者以后，只有马其昶称见过这书，他在《戴南山先生传》中说：“尝见先生所辑《四书朱子大全》，独取朱子一家之言”㉓。但这样简略的记载，对我们认识这书无补于事。１９３４年，《安徽通志》馆刊行《安徽通志稿》一书，其中《艺文考稿·集部十六·别集类十五·〈南山集〉说：“名世有《四书朱子大全》，已著录。”但令人失望得很，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其实并未著录于书中。事实上这部书甚少传本，甚至到了１９５９年贺珏发表《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》一文，还把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归入“今已不传，或未发现”的作品之列㉔。

笔者因为研究戴名世的缘故，曾向多方面追查他的著作下落，终于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有《四书朱子大全》的刊本，后来更得阅据该刊本制成的微型胶卷。微型胶卷所摄《四书朱子大全》一书，并无扉页及序跋，不知是原书本缺，抑或摄影时漏去。全书共为四十卷，所分卷数与《四书大全》稍有出入。如在《四书大全》中，《大学章句大全》、《大学或问》各占一卷，《中庸章句大全》、《中庸或问》各占两卷；但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却以《或问》散入《章句》内，而《大学朱子大全》和《中庸朱子大全》各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至于《论语朱子大全》及《孟子朱子大全》各有十四卷，则与《论语集注大全》和《孟子集注大全》的卷数没有差别。

在《大学朱子大全》、《中庸朱子大全》、《论语朱子大全》和《孟子朱子大全》各首卷第一页，都刊有编纂校订者姓名，抄录如下：

桐　城　戴名世　原编
钱　塘　程逢仪　重订

歙　县　程　崟　吴　县　张士俊
归　安　江三锡　休　宁　程文炘　同定

据前引戴名世《四书朱子大全序》，该书由他属笔后，“因简帙重繁，又属程君（凤来）去其重复，正其讹舛”，因此“钱塘程逢仪”应即程凤来。

戴名世在《四书朱子大全序》阐释编纂该书的义例说：“余是书一以朱子为主，其于朱子之书，一以《集注》、《章句》为主。至于朱子他书，与《集注》、《章句》互相发明者，采其精要，集而次之，而务一其旨归，其于诸儒，概弗之参载焉”㉕。据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微型胶卷，《四书朱子大全》确系纯用朱熹的说法为注疏，而且戴名世等并无任何按语评说。同时书中对所征引资料的编排，也和上引序文所说没有出入。

清代厉行文字狱，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不但身罹惨祸，而且所有著作受到禁毁，以致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淹没无闻，更使后世的学术研究者困难重重。就戴名世来说，诚如贺珏指出："研究的材料，主要根据他的文集——《南山集》。戴名世的其他文字和著述，如《四书朱子大全》、《周易文稿》、诗集《齐讴集》等等已不传，或未发现……这就为我们今天考察这位历史人物造成重大困难"㉖。有鉴于此，所以特地写成这篇文章，报告《四书朱子大全》的下落，并期望戴名世其他的著作能陆续被发现。

---

①顾炎武：《日知录·四书五经大全》说"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，名曰《集义》，止《大学》一书"。《四库全书·四书大全·提要》则说"真德秀始采朱子语录附于《大学章句之下为《集编》"后说实与顾说无异，只是将书名改为《四书集编》而已。但据永等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四书集编》说：此书惟《大学》一卷、《中庸》一卷，为德秀所手定……其子志道序，亦惟称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而云《论语孟子集注》，虽已点校，集编则未成。咸淳九年刘才之序，始称西山（真德秀）所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惟《论》、《孟》二书阙焉，扣之庭闻，则云已经点校，本未编辑，是《论》、《孟》固未尝无成书。一旦论诸堂上……因勉其（刘承）集成书。凡五阅而帙就，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。是《论语》十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，皆刘承以德秀遗书，补辑成之者也。由此可见，真德秀所编，非止《大章》一书而已，而该书名为《四书集编》，并非《四书集义》。

②③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《四库珍本》6集，《四书大全提要》。

④⑥方苞：《南山文集序》。

⑤⑧《南山文集》卷3，《自订时文全集序》、《吴七云制义序》。

⑦《南山文集》卷5，《答张氏二生》书。

⑨《南山文集》卷4，《小学论选序》。

⑩⑪⑱㉕《南山文集》卷4，《四书朱子大全序》。

⑫⑭⑮《南山文集》卷6，《赠刘言洁序》。

⑬⑯《南山文集》卷4，《春秋正业序》。

⑰《南山文集》卷6，《赠许亦士序》。

⑲萧穆：《敬孚类稿》卷10。

⑳（清）无名氏：《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》，邓辑实《古学汇刊》第1集《杂记类》。此文无作者姓名及撰年。据《清儒学案·望溪学案·戴先生名世》载，此文为萧穆所撰《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《革命远源》"戴名世案"则说作者是顾实。从《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》称"吾乡方戴两家书案"之语看，作者必为桐城人。萧穆虽是桐城人，但孤说难靠，尚待考证。至顾实为江苏武进人，自然不是该文作者。

㉑详拙著《戴名世及其〈南山集〉案》上册。《安徽通志艺文考稿》则说"禁书目有《孑遗录》、《意园文集》、《忧患集偶钞》、《戴田有集》、《戴田有全集》。姚子素《桐城文录入选诸家著述考·戴名世》亦只列上述五种（《学风》4卷4期）。周毅《馆藏清代禁书述略》（下）则谓"戴氏著作之被禁者，有《孑遗集》、《忧患集偶钞》、《意园文集》、《南山集》、《戴田有全集》、《戴田有时文》六种"。此外，Lynn A·Struve说"只有南山集"（原注：包括《孑遗录》）名列在乾隆年间的禁毁书目"。贺珏《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》指《四书朱子大全》在"乾隆间列为禁书"。上说都不正确。近人所编禁书目录如孙殿起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所列七种禁书，其中五种都为后人所辑戴名世文集，与原著内容和篇数都有显著不同。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58年版吴哲夫《清代禁毁书目研究》不但完全抄袭上书，甚至误以康熙年间的《南山集》与民国十一年皖黄宝文书局刊的《南山集》为同一书。

㉒《南山先生年谱》附于《南山文集》，页17下。此谱即《潜虚先生年谱》。

㉓马其昶：《戴南山先生传》，《桐城耆旧传》卷8。又《民彝》1卷4期，1927年5月。

㉔㉖贺珏：《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》，《安徽学史通讯》1959年4、5期合刊。